

全文化视角下的周公

陈虎

周公，姬姓，名旦，是西周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他曾协助周武王伐纣灭商，辅佐周成王而摄政，东征平定管叔、蔡叔、霍叔与商纣王之子武庚的叛乱，营建洛邑，制礼作乐，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完善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周公开创了千秋伟业，被后世尊奉为天下第一圣人——元圣。《尚书大传》中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基本概括了周公的主要历史功绩。

摄政救乱，平叛践奄

周武王在周公、召公、毕公等人的辅佐下灭亡殷商王朝后，对于如何处置殷商的奴隶主贵族，周公提出了给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的策略，释放了被殷纣王囚禁的箕子，将商容的故居修缮一新，安葬了被殷纣王杀害的王子比干，散鹿台之财，打开巨桥粮仓，赈济饥民，封纣子武庚为诸侯，有力地争取了殷之遗民。封管叔、蔡叔、霍叔为殷之三监，并与武王商谈，计划在伊水和洛水之间建立新都。

灭亡商朝之后的第二年，周武王因积劳成疾，病逝于镐京，留下了年幼的成王，当时“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尚书·大诰》），内部是“群公惧”（《史记·周本纪》），内忧外患不断。为了应对这一局面，周公毅然以冢宰的身份总摄国政，辅佐成王，向诸侯发布号令、大会群臣、为武王举行了葬礼、在列祖列宗面前为成王举行了成人礼，稳定了人心。但周公的行为引起了许多人的猜疑，不仅管叔、蔡叔四处散布“周公将不

利于孺子（指成王）”的谣言，就连召公、太公和成王也都不明白周公的心志。周公首先说服了召公和太公，此事在《尚书·君奭》中有详细记载。成王启《金縢》之书，明白了周公的良苦用心，历史记载“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为了查清东方管、蔡和武庚等人叛乱的事实，周公“避居东都（东方）”，一方面访查致乱的根源，一方面为东征平叛做准备。《金縢》中说“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调查清楚了叛乱的情况，“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鸛鸣》”。在诗中，周公以恶鸟鸛鸣比喻武庚，诗中的“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明确指出，武庚不仅要叛乱，还要颠覆我周人的政权（该诗现存《诗经·豳风》中）。看到《金縢》之书和《鸛鸣》诗，再加上当时气象屡屡出现异常，成王彻底醒悟了，改变了对周公的看法，率群臣亲自到郊外迎回了周公。

统一了内部意见后，第二年周公举行东征，发布了讨伐檄文《大诰》，平定了三监的叛乱，杀掉了管叔鲜和武庚禄父，流放了蔡叔度。蔡叔死后，他的儿子胡能够“率德训善”，周公听说后，便提拔他做了鲁国的卿士，胡把鲁国治理得很好，后来周公又把胡

封到了新蔡，建立了陈国。

周公平定叛乱后，又乘胜向东方进军，继续扫荡殷商王朝的残余势力，灭掉了奄（今山东曲阜）等50多个小国，把飞廉赶到了海边杀掉，使周朝的势力延伸到了海边。周公东征，历时三年，《诗经·东山》、《豳宫》

周公像



和《今本竹书纪年》中均记载有“伐奄，三年讨其君”，“迁其君于蒲姑”，将微子启封在宋，使其奉祀殷的祖先，“作《微子之命》”。周成王也亲自参加了这些征伐行动，《今本书序》中说“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向天下诸侯通报东征的胜利成果。金文中的《禽簋》、《王在鲁尊》等，也记

载了成王与周公伐奄之事。

武王克商，只是打击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直到周公东征，才扫清了它的外围势力。可以这样说，周公东征的最后胜利，既解决了武王死后周内部的王位争夺问题，又是商周两大势力的再次较量，对于西周王朝的巩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年的东征，就像急风暴雨席卷了黄河下游地区，并搅动了原有民族部落的格局：徐的一部分逃到了江南（今江西）；一部分东夷人被赶到了淮河流域；嬴姓西迁；楚逃到了丹水流域。这是我国

先秦时期一次重要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

东征的战斗是残酷激烈的,《诗经·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长期的征伐战争不仅使被征服地区蒙受了重大的损失,而且也使周本土的生产和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町疃鹿场,熠熠宵行”(《诗经·东山》),东征将士回到家乡,看到的是土地荒芜、人烟稀少的凋敝景象。可以说,正是民众卓绝的奋斗和巨大的牺牲,才换来了周王朝的巩固,赢得了历史的进步。东征之后,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了疆域范围东至大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了。

建侯卫,营成周

局势稳定下来后,如何巩固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呢?周公的答案是必须分封周族中最值得信赖的人和功臣到各地为诸侯王,使他们成为周王室的藩屏。

于是,周公把弟弟康叔封在原来商王朝统治的中心,以朝歌为都(今河南淇县),建立卫国,“迁殷民于卫”,分给他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等有某些手工艺专长的殷民七族。康叔的封地不仅面积大,而且统有八师的军队,以防止殷商旧人的再度反叛。周公还先后给康叔《康诰》、《酒诰》、《梓材》等训令,反复告诫康叔要“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使殷民能够正常地从事生

产活动;但对饮酒成风、不孝不友的风恶习,又要毫不客气。卫国之封,对镇抚殷民、戍守东方、防卫东夷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周公灭奄后,周公初封于奄地,长子伯禽就封,以曲阜为都城建立鲁国,分给他徐氏、条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这些具有某些手工艺专长的殷民六族,“迁庶殷于周”,并为之制定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国方略。封太公望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为齐侯,建立齐国,封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并且有专征专伐的特权,“五侯九伯,实得征之”。封召公奭于蓟(今北京西南),建立燕国,平叛后,召公长子就封,作为周东北方的屏障,既可以切断殷商旧族和他北方同姓孤竹国的联系,又可以和东北地区的肃慎族靠近。周公又以桐叶无欺为由,请封成王的弟弟唐叔虞于晋,受怀姓九宗,并制定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建国方针。

除上述封国外,周公还分封了大量的同姓国和异姓国。据《荀子·儒效》记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遍布各地的诸侯国,确立了周室对地方统治的政治秩序。应该承认,周公创立的分封制度,基本解决了周王室对原来殷商统治下东方地区的控制问题,对周王朝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大意义。这种封邦建国的政治体制,对后来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修建洛邑，对于周初巩固对东方地区的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洛邑就是现在河南洛阳的前身。周人本来偏居西方，克殷之后，为便于对东方广大地区的控制，客观上要求周人政治中心东移。周武王时，就对在洛汭到伊汭一带兴建洛邑进行过反复考虑，希望在夏朝的故土上建立其国祚，立其“天室”（见《逸周书·度邑解》），从而“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何尊》铭文），只是由于当时政权尚不稳固，再加上武王很快去世，没有付诸实施。

周公摄政，平叛践奄之后，开始着手营建成周的工作。周公将许多殷商遗民迁徙到洛邑一带，这样既可以利用这批劳动力修筑城邑宫室，又可以使殷商的残余势力失去根基，使他们直接处于周王朝的监视之下，这对于稳固中原地区的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

洛邑的兴建，自成王五年二月乙未日从镐京出发到伊洛选址，至成王七年，经“复卜申视”，反复勘察，历时两年，粗具规模。《尚书》中的《召诰》、《洛诰》、《多士》皆为此时所作。营建之初，周公将经过详细勘察的洛邑地形、河流和城市的详细地形、建筑分布图以及多次占卜所得的结果全部上呈成王，这些地图和文字，很可能就是被后世图谶家们渲染得极度神秘的《河图》和《洛书》。

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载：周公“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

北因于邙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另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洛邑可能一直到周成王十七年才最终建成。于是，成王十八年，正式定鼎洛邑。洛邑又名新大邑、成周，实际上它由两个部分组成，在瀍水以西的为王城，主要是宗庙和宫殿，以东的为成周，主要安置殷商的遗民。据文献记载，洛邑城中有许多宏伟的建筑，如“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逸周书·作雒解》）等，为后来洛阳城的建城理念、建筑规模和建筑布局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洛邑的建成，对周朝加强对东方的控制，以及维护周朝此后二百多年的稳定发展、促进东方地区的繁荣，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制礼作乐，遗仪后世

周公合诸侯，迁殷民以营洛邑，而后治礼作乐，《尚书大传》记载：“周公……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这一记载虽然不一定完全可信，但在周初大规模分封诸侯、新的都城建成后，用一定的制度规范、肯定和完善这种已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却是合乎逻辑的。

据《礼记》记载：“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中庸》），“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这些繁缛的礼仪不可能都是由周公制定的，肯定有所继承，这一点孔子曾有所交代，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论语·为政》)也就是说,孔子认为周朝的典章制度是从商朝继承发展而来的。但根据《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的鲁人“先君周公制周礼……在《九刑》不忘”可知,周公曾制定了周代的礼乐也是可以肯定的。

周公制礼作乐,就周礼来说,大致可以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作为抽象礼的道德原则的礼仪。对此,《礼记·礼器》中有记载:“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也就是说,礼对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主要靠内在的主动性而不是外力的强制,于是诸如忠、孝、仁、义等道德戒律就成了礼的重要标准。在宗法制度下,尊尊、亲亲就构成了周礼中的两条根本原则。周礼重亲亲,而后及于尊尊,先父慈与子孝,而后及于君仁与臣忠。由孝推及忠,由人伦推及君臣。周礼的这种特质,应该说是由周公奠基而成的。所以,周公特别强调“明德”,“同心则同德”,“同姓则同德”,道德标准就成了周公政治伦理的核心。因此,周公在制礼作乐过程中,以礼仪观察德行(“则以观德”),以德处置事情(“德以处事”),这样,“德”就不仅包含了人们主观方面的修养,也包含了在客观方面的行为规范。德就是礼,礼也就成了德。从此,中国就拉开了道德伦理社会发展的序幕。

二是礼仪或礼节。这是关于礼具体的制度规定,是指礼的物质方面。其内容大体可分为吉、凶、军、宾、嘉五个大的方面。如果再把它细化,就

有所谓的“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真可以说是繁文缛礼啦。大到国家的政治、军事,小到日常生活中的衣冠、陈设,都有具体的规定。然而,周公生活的西周初年,周礼还属于初创阶段,周公制礼,应该是举其大要而已。但后来体系周密的周代礼乐,其基础却是由周公奠定的。现在所存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号称“三礼”,三礼记载的无疑都是周代的礼制,虽然三书的成书很晚,尤其是《礼记》,应该是孔门后学七十子之徒的传礼之作,其最终被写成定本可能已到了汉初,但这些书所记的内容,则无疑是对已经施行的礼制的系统化和总结。

三是礼俗。其中一是对前代旧礼的因袭,二是周人本身的社会风俗和道德习惯。前者主要指周礼对夏、殷二代礼的因袭,“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论语·为政》);“周鉴于二代”(《论语·八佾》)。可以说,周礼中对前代所流行的礼的因袭乃是主要方面,而对周人旧俗乃至各地具体礼俗的仪节也是这样。《周礼·地官》注中有“礼俗,邦国都鄙民之所行先王旧礼也。‘君子行礼,不求变俗’”,从这个层面上说,所谓的周公制礼,只是在因循前代之礼时,根据周初社会的具体情况而进行的有选择的“损益”,使之更加适用于当时社会的生活实际而已。

同时,礼又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从广义说,大凡国家的政教刑法、朝章国典都可以笼统地称之为礼;狭义地说,礼就是指的贵族经常举行的

祀享、丧葬、朝觐、军旅、冠婚等方面的典礼。由此可知,西周初年,周公的制礼活动还应包括制订刑法等方面。关于周公曾制订刑律,在典籍中也有记载,《左传·昭公六年》记载郑国铸刑书时,晋叔向致书子产云:“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杨伯峻认为《九刑》成于周初。《左传·文公十八年》称,周公作誓命;“在《九刑》不忘”。《逸周书·尝麦解》开头就说:“维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庙,乃尝麦于太祖。是月,王命大正正刑书。”这件事发生在周公平定三监叛乱、灭奄东征之后,这里所说的“正刑书”,可能就是指的“作《九刑》”。当时周公摄政,像这样的国家大事无疑肯定是由周公主持的,所以《九刑》之中还记有周公制礼时的誓命之语。由此又可以说周公是后代法家的始祖。

乐也是周公制礼作乐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据相关文献记载,在殷周时代,礼典的实施,往往是配合着一定的乐舞。周公所作的乐,到底有哪些,想通过文献记载已很难详细了解,但周公作了歌颂武王的《大武》乐,却是可以肯定的。据《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克之于牧野……归乃献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诗经·周颂·武》孔颖达疏中 also 说:“《武》诗者,奏《大武》之乐歌也。谓周公摄政六年之时,象武王伐纣之事,作《大武》之乐歌也,既成而于庙奏之。”

以上的记载都说明,在周人于牧野之战灭亡了殷商王朝后,周公确实奉周武王之命创作了名为《大武》的乐歌,用于当时的重要庆典活动。

周公制礼作乐,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周朝的统治彻底走向了正轨,对西周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周公制定的这套礼法制度,对中国西周以后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后来中国封建社会从政治、军事等国家大政,一直到社会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种规范和制度,无一不是从周礼中继承和演变而来的。

周公作为周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不仅在灭商、建立健全周朝的政治制度、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繁荣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作为儒家学派和法家学派的创始人,更对此后数千年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用“经天纬地”来评价周公一生的功绩,丝毫不过分。正如清乾隆皇帝所说:周公是“官礼功成,宗国馨香传永世;图书象演,尼山绕绪本先型”,正恰当地道出了周公对中国文化的首创贡献。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也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中国古代史》)清代学者孙诒让说:“周公纘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礼记正义·序》)成康二王之时,“天下安宁,刑错四十年不用”(《史记·周本纪》),这与周公的努力不无关系。

周公的形象非常符合后来儒家道德的理想人格,因而他本人便成为了儒家的先驱,周公的实践活动成了儒家思想的典范。周公“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勤政尚贤”等政治思想,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直接源泉。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春秋时代激烈的社会变革,对孔子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孔子向往“郁郁乎文哉”的“周公之治”,他一生孜孜以求的就是周公的事业。在他心目中,周公是最令人敬服的古代圣人之一,所以他甚至常常“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孟子也常提到周公,曾把他与大禹、孔子相提并论(见《孟子·滕文公下》)。在荀子看来,周公的行为更是“非圣人莫之能为”,周公的行为,乃是“大儒之效”(《荀子·儒效》)。这已清楚地表明孔子及儒学思想体系的影响,他们对以周公为代表的古代圣人存留下来的思想资料进行了思考和继承是自不待言的。后人赞颂周公,也都着眼于这一点。如明人陈凤梧《元圣文宪王像赞》曰:“天生元圣,道隆德备,制礼作乐,经天纬地。上承文武,下启孔颜,功在万世,位参两间。”(《东野志》)难怪汉代以后的人常常周、孔并称,如张衡的《归田赋》中云:“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蔡邕的《释诲》中云:“盘旋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为友。”周公的形象又非常适合传统社会中普通百姓对官吏在道德和修养方面的要求,历史上在洛阳当地就流传着周公为处理纷繁复杂的国家大事一餐三吐哺的故

事。在江苏徐州、山东嘉祥发掘的汉代墓葬中,都曾出土了“周公辅成王”的画像石。在嘉祥的武氏群墓中,竟发现了三幅“周公辅成王”画像石,由此可见周公的形象对当时社会生活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由于儒家学派不断地对周公进行大力神化,所以周公一直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是可望不可及的圣人。周公死后,被后人奉为“元圣”,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又追封周公为“文宪王”。后人为了纪念周公,首先于“凤凰明矣,于彼高岗”的岐山凤凰山南麓建立周公祠,历史上韩愈、苏轼、康海等许多文人墨客来此游览抒怀,留下了140多首诗文和30多通碑石。在洛阳和曲阜也同样建立了祭祀周公的祠庙,以寄托人们对周公的追思。洛阳周公庙始建于隋末唐初,为隋末大将王世充草创。唐太宗贞观年间、唐玄宗开元年间重修,后因战乱被毁。明嘉靖四年(1525年)在旧址上又重建,万历四十七年再次重修。清康熙十三年进行全面的大修。以后乾隆、光绪和民国时期都曾进行过维修和扩建。洛阳周公庙坐北面南,现存的一组古代建筑,依中轴线自前至后依次为定鼎堂、礼乐堂(会忠祠)、三殿及东西廊坊。定鼎堂内供奉着周公、召公、毕公及周公长子伯禽、次子君陈等五尊圣像。定鼎堂后为礼乐堂(会忠祠),现也陈列着一组人物群像,再现了当年周公治礼作乐的场面。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